

留学生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参与和影响

周 牧

内容提要 清末的教育改革不仅是新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巨大变革。以科举制的结束和新的教育体制的萌生为标志,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体系土崩瓦解,现代教育体制开始萌芽。在此过程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改革,在新学制与教育发展规划的起草,新式学堂的创建、教学和管理,教科书的编写等方面,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留学生 清末教育改革 参与 影响

周 牧,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210029

清末的教育改革不仅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巨大变革。以科举制的结束和新的教育体制的萌生为标志,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体系土崩瓦解,现代教育体制开始诞生。在此过程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改革,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

一、参与新学制的起草

历史发展到清末,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宗旨,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无法为民族危机的消弭和社会的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一些具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如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以及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都提出了要借鉴、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主张。1901年5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介绍日本学制,也刊载了英、法、德等国的教育情况。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现代教育体制开始酝酿产生。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该学制虽未曾实施,但也不失为中国第一个新型学制。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又主持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在全国施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型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中国第一档案馆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5ZDB040)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1905年秋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1906年12月,设立学部。随后,各省设立提学使司,各州县设立劝学所等。虽然残留较多的传统教育痕迹,对女子教育也不重视,而且在借鉴国外学制时,几乎单纯照搬日本学制的模式,所建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也均以日本文部省为建制模式,新旧杂糅,带有明显的过渡痕迹,缺乏创造性,但毕竟初步建立了一套具有西方现代色彩的教育体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具体确定《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哪些具体内容是留学生所亲拟,但是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与留学生有关。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两个学制模仿日本学制的痕迹太深,但它又不是一般的照抄,如此,只有熟悉日本学制的人才能仿拟。而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只有两种人可以做到,一是短期赴日考察的官员,二是留日学生。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承担了具体的草拟工作。而无论就在日本时间之长,还是就在日本人数之多而言,留学生都无疑要大大超过赴日考察的官员。还因为,考察官员很少懂日文,考察期间的口译、笔译,乃至考察报告等工作都由留日学生充任。如为制定新学制,1902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无论是到文部省听具体情况介绍,还是与日本官员的会谈,所到之处,都是由留日学生章宗祥、吴振麟和张奎等翻译、记录。因此,留学生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况且,当时的湖北留日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就刊有管学大臣张百熙重视留学生“蓄意甚坚,虽去官不惜”^[1]的说法。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陆宗舆后来回忆,自己就曾参加“壬寅学制”“中大小学堂章程”的草拟^[2]。

至于“癸卯学制”的具体拟定者,除了张之洞门人胡钧所说的张亲自拟定的“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学堂中之中国文学课程”^[3]外,其余具体内容,王国维认为是张之洞的幕僚、曾到日本的陈毅所拟:“今日之《奏定学堂章程》,草创之者南陂陈君毅。”^[4]有的专家根据张之洞幕僚和学生中的人才情况,还推测胡钧、陈问咸和田吴照(留学日本成城学校)等,“对新式教育很熟悉,他们也极有可能参与了新学制的草拟工作”^[5]。这个推论基本可信。可惜未考论其有关人的经历,现补正如下:

胡钧(1869—1943),湖北沔阳人。1902年壬寅科举人。后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法科。毕业后历任两湖师范学堂堂长、湖北学务处参议、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山西大学堂监督等。从其对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具体内容的了解来看,他在当时不会是局外人;从其经历来看,参与其事也是够格的。

关于陈问咸,1900年5月12日,作为湖北自强学堂学生,与黄兴等被张之洞派赴日本短期学习。据《张之洞全集》所载:“外洋各国中小学堂之教科书,皆由官为编定,故师皆善教,教有定程。湖北现拟遵旨开办中小学堂,自以编译教科书为第一要义,经本部堂电商两江督部堂会派湖北农务学堂总经理委员候选光禄寺署正罗振玉,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堂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查应编之书,科目繁多,亟应遴派学有根底之高材生,随同罗署正前往采访购买,分门编译,以期迅速成书,早资应用。查有原派自强学堂之汉文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照五员,堪以派往,应令该教习等商同罗署正将新出普通学教科各级应备之书,广为采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呈候本

[1]《国闻志张管学》,《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详见陆宗舆《陆润生先生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社民国十四年(1925)排印本,第3页。

[3]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7页。

[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1906年第2期。

[5]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部堂核定,发刊颁用。”^[1]

田吴照,1897年入两湖书院,因得张之洞赏识,留学日本成城学校,回国后任湖北自强学堂教习。1901年任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同年底,随罗振玉等赴日考察教育,次年中举。1905年随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编有《欧美教育规则》,并著《考察教育意见书》。1906年冬,以学部查学委员视学山西。1908年10月,任游日学生监督及使署参赞,1911年回国。

由上可见,陈毅、胡钧、陈问咸、田吴照等人,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前,已由张之洞派往日本两次,有的还在日本留学。如董鸿祯1901年至1904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回国后长期任职学部。因为张之洞幕中有这样一些熟悉日本教育情况的留学生和游历过日本的人,所以,他们受命起草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但今之论者,在论及留日学生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关系时,大都引用民初教育家蒋维乔的一句话:“当时学制起草者,皆日本留学生”^[2],来证实留日学生的贡献。其实蒋维乔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应蔡元培之邀方进教育部的,他说的“当时学制”并不是指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制,而是指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而且,民初教育部有70人,其中60多人有留日背景,也正在起草学制,因此蒋维乔之语所指很准确。但粗心者一旦断章取义写入文中,而其他不去核实,竞相引用,难免不出差错!虽然事实应该是那样,但用蒋维乔的话来证明却是张冠李戴。

二、参与教育发展规划的起草

在此,需要先梳理“入阁”学部的留学生的情况。因为,这里所指的教育规划是在学部成立后出台的,而学部的设立,意在建立掌管全国的教育机构,规划原有教育体制的改革,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只有“入阁”才有机会参与这项工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但就已知的材料看,能够参与其事的熟悉新式教育者,莫过于留学生,尤其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留日学生。因此,学部自成立之日起,就源源不断地调拨留日学生入部办事,人数之多,远在其它各部之上,且多为一时之选。如《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提到的重要留学生即有:范源濂、何燠时、陈宝泉。范源濂(1875-1927),湖南湘阴人。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4年应清廷电召回国,任学部主事。民国后任教育部次长、教育总长。何燠时(1878-1961),浙江诸暨人,1898年留学日本。1905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1906年春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任工科监督,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陈宝泉(1874-1937),天津人,1903年到日本学习师范,1904年回国,1905年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同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主事,拟订学部开部之计划,改定中等以下学堂章程,主持图书局和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升郎中。又曾任普通教育司师范科员外郎。191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从他们的经历和任职来看,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此外还有留学日本的林荣、高步瀛、戴展诚、路孝植^[3]

[1]《张之洞全集》卷百四十七,《札罗振玉等前赴日本编译教科书并派刘洪烈赴日本考察教法、管学事宜》,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901年12月5日)。

[2] 滕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18-119页。

[3] 林荣,福建闽侯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1903年编译《国际公法精义》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回国后历任进士馆及仕学馆教习、教务提调、学部参事、京师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宪政编查馆统计局科员。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法政科监督等。高步瀛,1894年举人,1902年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1906年任学部侍郎,后调任图书局主编。戴展诚,湖南常德人,1895年中进士,与康有为同科,在北京会试时参与“公车上书”,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改调学部,历任

等。尚小明认为“他们多担任主事、郎中、员外郎等职,负责各项具体工作”^[1]。1901年底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王国维,根据其年谱记载,他做的具体工作更可明了。1906年春,他随罗振玉进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此外,刘崇杰还被学部奏调为“驻日调查学务委员”^[2],具体工作是及时了解日本教育发展的新动向。

概括地讲,“清末教育改革的各项规章制度多为留日学生所订或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学校制度方面,有《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法政学堂章程》、《变通初等小学章程》等;教员任用方面,有《奏定检定小学章程》、《优秀小学教员章程》等;考试奖励方面,有《改定各学堂考试章程》、《高等学堂毕业调京覆试各办法》、《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等;图书教材方面,有《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目》、《编辑各种教科书并答各省学司翻印初高两等小学教科书办法》、《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等。此外,在筹措教育经费、派遣留学生、审定编订教科书,巡视京外学务和进行全国学务统计等方面,留日学生也无不参与。”^[3]

三、参与新式学堂的创建、教学和管理

自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始,中国有了新式学堂,但数量有限。新政开始后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清政府大力倡导发展新式教育,新式学堂也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为广大学识之士特别是留学生参与新式学堂的创建、教学和管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由于清末学制和教学内容深受日本学制和教学内容的影响,而且鉴于师资的缺乏,1907年3月25日,清廷规定:“京外各衙门凡1907年所选派之出洋留学生及以前学务大臣暨部先后所派之官费留学生,将来毕业归国,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年限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他项差使。”^[4]

实际上在此之前,许多留日生回国后已经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堂,或者担任教职。如湖南的胡元

总务司员外郎,郎中右参议”。1901年宋教仁科举考试结束次日,即投门生贴拜见这位创办明达学堂、参与维新运动的常德进步人士。(钟发喜《宋教仁与漳江书院》,http://www.taoyuan.gov.cn/tywh/ArticleShow.aspx?id=21338)。又据〔日〕北冈正子考证:“1902年10月,弘文学院举行了因等待加纳治五郎回国而延期了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毕业生是与弘文学院设立同时入学的湖南省派遣来的速成师范科的学生。”(北冈正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加纳治五郎给第一批毕业生讲话的波澜》,《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靳丛林译自《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从弘文学院的入学到退学事件》第六章《加纳治五郎给第一批毕业生讲话的的波澜》,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31日,译文正题系译者所加。)当时湖南派往日本学习6个月速成师范科的有10名,戴展诚与杨度作为旁听生参加。当时杨度和加纳治五郎就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展开了多次论辩,戴展诚几乎场场必到。戴展诚与杨度是去考察日本国民教育的。路孝植,陕西周至人。1900年留学日本高等农业学校。1906年清政府给予举人出身,任学部总务司机要科员外郎等。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金事、北京农学校长。

[1]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53页,但对恒钧、刘宝和与陈槐未介绍。目前已知的情况是:恒钧,清宗室,鸦片战争时靖逆将军奕山玄孙。早年官派留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及历史地理科,办《大同报》,主张“满汉融和”。1907年与熊范舆、沈钧儒、雷光宇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1908年创办《中央大同报》。民国后曾任国会议员等。陈槐(1872—1931),浙江义乌人。秀才,后入杭州求是书院研读数理。1898年官费留学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后留日本编撰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大专教材,运销国内,风行一时。在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1911年回国,任陆军部军实司科长。1914年任北京大学数理教授。刘宝和是否留学日本宏文学院等,待查。

[2]《学部奏派刘崇杰等为驻日本调查学务委员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0,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10页。刘崇杰(1880—?),福建闽县人。190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后,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教育部福建学务视察员,是《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译校骨干。1910年起任驻日使馆一等参赞等。

[3]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53—54页。

[4]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743页。

倓^[1]于1902年与何炳麟^[2]、朱剑凡^[3]等人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认为得力于教育的发展”^[4],1903年回国后,集资两千余元为开办经费,在长沙创立的明德学堂,乃湖南第一所私立新式中学堂。朱剑凡先后捐献价值11万多银两的资产创立了周南女学。浙江的徐锡麟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与陶成章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贵州的周恭寿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贵阳创办了11所中小学堂^[5]。1905年11月,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东京8000余名留日学生罢课抗议,其中3000余名退学回国,返抵上海。1906年2月留学生中的姚洪业(东京铁道学校)等多方奔走,募集经费,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4月正式开学。此外,李士伟创办了北洋师范学堂,田吴照创办了南京暨南中学堂,侯鸿鉴创办了江苏无锡的竞志女学等。其他许多新式学堂也都是归国留日学生所创办,如后来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从日本宏文学院回国后,先后创办了民立初等、高等小学堂等。

留学生创办了新式学堂,自然地也就成为学堂的管理者,很多还是清廷及地方政府任命的官办学堂的管理者,直接参与了学堂的管理与教学。如留学英国的严复任安徽大学堂监督;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周震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李悦先后任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邵裴子、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陈大齐,先后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颜楷、日本法政大学的骆成骧先后任四川高等学堂监督;留美幼童出身的梁敦彦、唐绍仪先后任北洋大学督办等等。有的学堂的监督和教务长几乎都是归国留学生,如1906年创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8人):邵章(日本法政大学)、喻长霖(进士)、王廷杨(日本法政大学)、沈钧儒(日本法政大学)、夏震武(进士)、袁嘉毅(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孙智敏(日本法政大学)、徐定超(进士)。教务长(4人):经亨颐(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张孝移(日本早稻田大学)、杨乃康(日本早稻田大学)、许寿裳(日本宏文学院)。监督和教务长先后共12人,其中归国留学生9人,占总数的3/4。

又如1908年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监督(5人):黎渊(日本中央大学)、熊范舆(日本早稻田大学)、张鸣珂(进士)、胡钧(留日、留德)、李榘(日本政法大学)。教务长:籍忠寅(日本早稻田大学)。监督和

[1]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号耐庵,湖南省湘潭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1897年入选拔贡。1902年入选湖南首批官费留日生,就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在湖南长沙创办著名的明德学堂。

[2]何炳麟(1877-1966),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出生于一乡村教师家庭。1900年参加衡州府试取秀才。后考取官费留日,进入日本东京工业学校电气科学习。1908年10月应聘到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省立优级师范学堂任教,主讲《几何学》等。所编《几何图学教科书》为湖南各高等、中等学校教材,被誉为湖南制图学教学的开山祖。1909年邀集湘南名流,集资在长沙创办南路公学堂,后改为湖南第二公学堂,1914年学校更名为湖南私立岳云中学,任校长5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朱剑凡(1883-1932),曾名周家纯,湖南宁乡人,出生于官宦之家,为朱元璋后裔。1902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1904年回国,任宁乡速成师范教员。1905年毁家兴学,以私家园林“蛭园”改办周南女子学堂,即今之省长沙市周南中学。1919年创立健学会,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选为省议员,参加国民党“一大”,历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党委、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等职。“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抄家和通缉。1930年随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

[3]朱剑凡(1883-1932),曾名周家纯,湖南宁乡人,出生于官宦之家,为朱元璋后裔。1902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1904年回国,任宁乡速成师范教员。1905年毁家兴学,以私家园林“蛭园”改办周南女子学堂,即今之省长沙市周南中学。1919年创立健学会,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选为省议员,参加国民党“一大”,历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党委、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等职。“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抄家和通缉。1930年随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

[4]长沙明德中学校友会办公室:《胡元倓先生传略》,载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版,第1-2页。

[5]见何静悟:《辛亥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贵州省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1年版,第127-141页。

教务长先后共6人,其中归国留学生5人,占总数的5/6。

再如1908年创办的山东法政学堂:监督(4人)方燕年(进士)、孙松龄(日本法政大学)、丁惟汾(日本明治大学)、雷光宇(日本政法大学)。总教习:王鸿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监督、教务长和总教习先后共5人,其中归国留学生4人,占总数的4/5。

据统计,在清末116所官办学堂的监督、教务长等管理人员中,其中76所由归国留日学生担任,占所调查学堂总数的65.5%;在全部340名监督和教务长中,留日出身者有127名,占37.4%^[1]。由此可见回国留日生在清末新式学堂管理层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检查各地新式学堂的办学情况,清廷还设立视学制度,巡视各省学务。视学官虽然不是学堂的具体管理者,却是上级部门派来检查、督促的官员,因此,也可以说是特殊的管理者。1909年学部颁布的《视学官章程》规定,全国设12个视学区,每一学区设视学官2人,每省设视学员6人,每县设视学员1人。视学员“深明教育原理者方为合格”,“各区所派视学官须有精通外国文及各种学科者一人,以便考察中学以上之教法”^[2]。而省视学员则由“曾习师范,或出洋游学,并曾充当学堂管理员、教员积有劳绩者充任”^[3]。因此,一般科举出身的难以具备这种资格,很多留日学生得以捷足先登。如1909年戴展诚到河南、江宁、安徽、江西、湖南等省视学抽查;1910年留学日本的刘宝和、萧友梅奉派视察直隶、山西两省学务。

在清末兴办的新式学堂中,不少留日学生担任教师,成为师资的主要来源。如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1904年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并兼安徽公学及附设的安徽速成师范学堂教师。后来又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创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任“监学”和教育、地理、东语等课程教员。又如鲁迅,1902年东渡日本,先后在宏文学院和仙台医专学习,1909年回国,被聘为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和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兼任植物学日语翻译,与从日本宏文学院回来的夏丏尊同事。“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下,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4]其实,单纯的学堂管理者很少,他们基本上都担任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教学。

可见,留学生归国后有不少人从事过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更新了晚清教育界的师资结构。据郑世兴统计,1907年在全国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的教员中,留学生出身者757人,占教员总数的26.1%^[5]。实际上,在当时中等以下学堂的管理者和教员中,留学出身者占有的比例也不会低。据统计,在清末各省优级师范学堂的467名教员中,归国留学生有144名,占30.8%;在全国23个行省的1171名专门学堂教员中,归国留学生有370名,占31.6%;在1544名实业学堂教员中,归国留学生有243名,占15.7%^[6],在这三种学堂教员中,归国留学生平均占26%。

四、积极编写教科书

在中国现代教科书编纂史上,19世纪中后期主要是西方传教士编辑的居多。随着留日大潮的

[1][6]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77页,第144页。

[2]《视学官章程》,《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一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8页。

[3]《奏定各省学务官制办事权限及劝学所章程折》,《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宣统元年(1909年)。

[4]夏丏尊:《鲁迅翁杂忆》,见茅盾、巴金等:《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5]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62-78页。

涌起,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成为编辑教科书的主力。新政之初,曾任清廷出洋学生总监督的夏谐复,建议中国教科书的编纂应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1]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直到辛亥革命前,清末中等以上各级各类学堂的教材大都译自日文,其中,留日学生功推第一。他们一边翻译日本现成教科书,一边自编新的教科书,还组建了一批教科书编译机构。如宏文学院讲义录编辑部、清国留学生会馆、湖南编译社、东京同文印刷社等。其中陆世芬主持的教科书译辑社为专门译介教材的翻译团体,专门编译中学教科书,备国内各学堂选用。1903年4月该社刊行的书目就有:中学物理、生理、化学、地理、代数、几何等教科书,几乎包括了中学所有门类的理科教科书。

1906年,清廷学部下设编译图书局,专门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参与此项工作的大部分是留日出身者。一些原来精于此道的留学生被调到该局,如陈宝泉即被调任图书局长总办,主持教科书的编辑,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书目。更多的归国留学生被各出版机构争相罗致,或为编辑,或任撰述,参与教科书编译工作。当时国内新出现的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时中书局、文明书局等,因竞相编辑出版教科书,更是高薪聘请留日学生。

1906年,学部在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的基础上,公布了一批中小学用教科书,其中多为留日学生翻译或编著,如作元八著《欧罗巴通史》,胡景伊等译;矢津冒永著《世界地理学》,吴启孙译;〔美〕斯起尔著《中学生理科教科书》,何燠时译补,〔美〕那尔德著《化学探原》,范震亚译;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陈文哲编《普通应用物理教科书》,蒋智由编著《中学修身教科书》,李春辑译《新撰小学体操法》等。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中辉煌的硕果,新式教科书的使用为从根本上改造和培养晚清中国的一代新人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断裂。故留学生的功绩实非功利主义观所能概括。

综上所述,清末的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而留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值此风云际会之际,得以参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他们虽然不是教育改革的主导力量,但是因其先进的国外教育背景特别是留日教育背景,在新学制与教育发展规划的起草,新式学堂的创建、教学和管理,教科书的编写等方面,发挥了具体的多方面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教育史上这次巨大的变革,为科举制的结束和新的教育体制的萌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责任编辑:肖波]

[1]夏谐复:《学校台言》,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